

亲眼所见: 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 与中古拉丁欧洲传记的转型

李隆国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长期以来, 学界比较研究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 尤其是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文化背景之下讨论二者的联系。其实这两部作品在史源限定原则上存在重大差异, 尽管借鉴古代传记依类叙事结构的写作原则, 艾因哈德引入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原则, 不仅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叙事权威和可信度, 而且还将神似与形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艾因哈德复兴了拉丁文君王传记之后, 继起的类似传记则转而采纳了编年体例, 从而强化传记的叙事与形似色彩, 而淡化其神似色彩。中古拉丁君王传记也就具备了独特的写作体裁。

〔关键词〕《查理大帝传》 艾因哈德 编年体 传记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23) 03-0061-12

至少从 16 世纪末开始, 学者们就业已认识到, 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以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作为写作模板。^① 9 世纪瓦拉弗里德的编辑本就使得写作结构方面的模仿业已非常清晰。这位比艾因哈德晚一代的廷臣、海歇瑙修道院的院长为传记分节(凡 39 节), 并为每一段添加了精当的小标题。借助于这些标题, 学者们发现, 除了查理曼称帝以及传位给儿子虔诚者路易这两节之外, 其余全部内容都是两部传记所共同拥有的。^② 1829 年, 佩尔茨在为德意志文献集成本编辑现代精校精注本的时候, 便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了艾因哈德对《罗马十二帝王传》的引用。诚如《查理大帝传》的中文译者戚国淦先生所介绍的那样, 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 这种模仿“是从全貌乃至细节的全面模仿”。^③

20 世纪初, 法国学者路易·阿尔芬系统地比较了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查理大帝传》似乎就是第十三篇罗马帝王传。进一步系统核查艾因哈德的史源之后, 阿尔芬甚至说, 一方面艾因哈德抄录

〔收稿日期〕2023-04-18

〔作者简介〕李隆国,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世界之中世纪史、外国史学史。

① Isaac Casaubonus(1559-1614)发现了这一现象。Dom Marin Bouquet ed.,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nouv. ed., tome 5, Poitiers: Imprimerie de Henri Oudin, 1869, p. 87.

② David Ganz, “Einhard’s Charlemagn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reatness”, in Joanna Story ed.,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8-51.

③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 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第 3-4 页。英译者格兰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A. J. Grant trans. & ed., *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 by Einhard & The Monk of St. Gal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2, pp. xii-xiii.

过多; 另一方面他的改写过于主观; 因此传记的真实性大可置疑。^① 随后, 比利时学者弗兰索瓦·路易·冈绍夫加以部分反驳, 认为传记有关战争部分的叙事错误较多, 但涉及查理曼私生活的叙述则大体可信。^② 但是, 学术界并没有因此恢复对艾因哈德的信任。^③

将艾因哈德从史源猎人们的枪下挽救出来的是史学家。如索森在 1970 年所言, 任何历史作品都是文学艺术创造, 艾因哈德通过复兴古代传记将中古史学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④ 1997 年, 英国学者马修·英尼斯系统论证了苏维托尼乌斯在加洛林宫廷和知识精英中的流传和接受情况, 他也认为艾因哈德通过模仿旨在参与当时的政治对话, 创造新的基督教文化。^⑤

2006 年德国学者谢尔贝里希从八个方面系统细致地比较了艾因哈德与苏维托尼乌斯的写法, 说明了二者尽管在结构、段落链接词的使用、偏好使用第一人称、引用古希腊拉丁典故、偶尔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等方面相当接近, 但是二者也存在重大差别: 苏维托尼乌斯是传记作者而艾因哈德是历史学家, 而最为广泛的差别是二者的语言用法不同。他甚至推测, 艾因哈德的修辞榜样是西塞罗而非苏维托尼乌斯。^⑥ 2013 年, 德国学者斯蒂芬·帕卓尔德进一步从模仿西塞罗的角度, 充分肯定了艾因哈德的写作能力。在退隐之后, 艾因哈德不甘寂寞, 基于古典写作原则创作《查理大帝传》, 试图成为“新西塞罗”, 藉此向虔诚者路易及其宫廷证明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宫廷智慧。^⑦

注重作品叙事技巧的学术潮流最终影响到传记的编辑工作。2019 年出版的法文新译本试图取代阿尔芬的旧版本, 其编者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 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加上一位语言学家, 以便更好地揭示传记的修辞特色, “为了给这部中古历史名著增加一个新的(文学)面向”。^⑧ 编者明确地指出, 新的研究成果共同见证了传记文献研究的焦点转移, 即从传主转向作者。过去研究者会从《查理大帝传》中寻觅查理曼的信息, 现在则还要理解艾因哈德及其创作的文化环境。^⑨ 在这种新的研究趋势下, 传记的真实性与传记的叙事技巧之间更加呈现为一种紧张关系, 以致于我们必须回答, 二者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换言之, 注重叙事技巧的作者如何实现传记的真实性?

本文拟从传记作为体裁的角度, 通过比较分析《查理大帝传》和《罗马十二帝王传》, 说明艾因哈德借鉴当时流行的圣徒传写作方式, 引入亲身经历这一原则, 达成了传记写作中叙事技巧与真实性的巧妙结合。从复兴到创新, 《查理大帝传》在欧洲拉丁传记体裁的历史上承上启下, 开辟了中

① Louis Halphen, “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Charlemagne”. III. Einhard Historien de Charlemagne, *Revue Historique*, 14, Tome 126, fasc. 2, 1917, pp. 271–314. 恩斯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 古代、中世纪和近代》, 黄艳红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29 页。

② François-Louis Ganshof, “Notes critiques sur Eginhard, biographe de Charlemagne”,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tome 3, fasc. 4, 1924, pp. 725–758.

③ W. S. M. Nicoll, “Some Passages in Einhard’s ‘Vita Karoli’ in Relation to Suetonius”, *Medium Aevum*, vol. 44, No. ②, 1975, pp. 117–120.

④ R. W. Southern, “Aspects of the European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1.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from Einhard to Geoffrey of Monmouth”,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fifth ser., vol. 20, 1970, pp. 173–196. 中译本参见罗伯特·J. 巴特莱特《历史与历史学家: 理查德·威廉·索森选集》, 上海三联书店 2020 年版; 朱君棣《加洛林时代史学成就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⑤ Matthew S. Kempshall, “Some Ciceronian Models for Einhard’s Life of Charlemagne”, *Viator*, 26, 1995, pp. 11–37. Matthew Innes,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in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Ninth-century encounters with Suetoni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vol. 3, iss. 3, pp. 265–282.

⑥ Klaus Scherberich, “Zur Suetonimitatio in Einhard’s ‘Vita Karoli Magni’”, in Lotte Kéry ed., *Eloquentia copiosus: Festschrift für Max Kerner zum 65. Geburtstag*, Aachen: Thonet Verlag, 2006, pp. 17–28.

⑦ Steffen Patzold, *Ich und Karl der Grosse: Das Leben des Höflings Einhard*,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3, chapter XV.

⑧ Michel Sot & Christiane Veyrard-Cosme eds. & trans., *Eginhard : Vie de Charlemagne*, nouvelle édition, Paris : Les Belles Lettres, 2019, p. ix.

⑨ Michel Sot, “Au fondement du souvenir de Charlemagne: La Vita Karoli d’Eginhard”,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tome 93, fasc. 3–4, 2015, pp. 739–753. 陈文海《中世纪世俗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叙事逻辑》,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侯树栋《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 《史学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古俗人传记的新方向。

一、最美夕阳红:晚年查理曼

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中译本,以格兰特的英译本为底本,后者又依托于于1867年菲利普·雅菲所编辑的现代拉丁文精校精注本。雅菲的本子依据的是C类抄本(尤其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拉丁抄本第10758)。^①今天流行的其他英文译本如企鹅世界名著丛书收录的译本(译者为著名文献学家大卫·甘茨)、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诺贝尔的《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中所收译本都以“德意志文献集成”精校精注本为底本。德意志文献集成本凡6版。1829年的最初一版所用底本为A本,该抄本只抄录了艾因哈德的传记正文。最新版由霍尔德-埃格尔于1911年编订,为汇编本,即将所有抄本中出现的内容都汇录在一起。一册在手,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各种不同抄本的内容异同;其缺陷则在于它与历史上的任何抄本都不尽相同。汇编本是一,而历史上存在的抄本则多为多。

中译本所依赖的英文底本没有收入虔诚者路易的图书馆馆长杰瓦尔德所撰的简短献词,而且还将作品分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他在国内外的事业”,第二部分“私生活和性格”。但这种分类法比较晚起,以抄本10C*为主。10C*抄本即维也纳皇家图书馆抄本第N. 990号,抄录于14世纪。^②但是从9世纪晚期或者10世纪初就有抄本将第18节开始的部分单独摘出来,插入到《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814年处。看来,“私生活和性格”部分颇有补于编年史,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二分法的正式出现较晚,但实际上渊源甚早。艾因哈德本人其实是将传记分为四个部分。作品首先追溯了加洛林王权的建立过程,包括前三节,这是引言部分。在第4节作者说明将要分三个部分来叙述。“先写他在国内和国外的业绩,然后写他的习惯和兴趣,最后写国家行政管理和他的统治的结束”。出于行文的方便,本文仍然遵循中译本的章节分类方式。

在传记的第一部分——“他在国内外的事业”,艾因哈德大体依照先后顺序,讲述了查理曼所进行的历次战争。从继位之初攻打阿奎丹,随后分别是意大利战争、萨克森战争、西班牙战争、布列塔尼战争、贝内文托战争、巴伐利亚战争、斯拉夫战争、对匈人和阿瓦尔人的战争以及未曾真正开战的北欧人战争。叙说结束的时候,在第15节艾因哈德总结了法兰克王国扩张的结果,一一列举查理曼所征服的疆土,以及臣服于他的各个族群。

在开疆拓土的同时,查理曼也获得了世界级名声。艾因哈德首先讲述了周边弱小王朝对查理曼的臣服效忠,然后说明了当时世界其他两极力量(拜占庭皇帝和波斯国王)对查理曼的友谊。第17节略微讲述了传主在国内的工程建设:教堂、宫殿、大桥等;以修建防御工事防止周边部族侵扰而结束。可谓一幅国泰民安的和平景象。

传记的这一部分,最遭历史学家诟病。一方面,艾因哈德仅用了一节的篇幅来讲查理曼的国内建设和治理,失之于略;另一方面,其有关战争的记叙既不真实,也无独特价值。阿尔芬曾经对照其史源,一一指出其不确之处,认为其病在“随意改动史料”。^③尽管如此,熟悉古代传记体裁传统的读者都明白,传记也讲述战争,但主要是藉此表彰传主的功德,刻画其性格。所以,在艾因哈德的笔下,历次战争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查理曼先礼后兵,要求服从,并最终得以宣示其统治权。通过这些胜利,艾因哈德既说明了传主后人无法仿效的功业,也刻画了一位意志坚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军事统帅形象。

传记按照传主对内、对外所涉及的各方面分类讲述。在每一类中,又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安排叙事。战争部分时间感明确,每一场战争就像一个画片,而时间的线索将这些画片串联起来,给人历

① Philipp Jaffé ed., *Monumenta Carolina, 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vol. 4, Berlin: Weidmann, 1867, pp. 487-541.

② G. H. Pertz ed., *Einhardi Vita Karoli Magni*, MGH, Scriptorum tomus II, Hannover: Hahn, 1829, p. 445. No. w.

③ Louis Halphen, “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Charlemagne. III. Einhard Historien de Charlemagne”, pp. 271-314.

历在目之感。

私生活部分即第二部分从第 18 节开始,从传主的家庭说到传主的死亡。这一部分似乎不那么具有线性演化痕迹。其实,作者并没有改变叙事策略,只是将叙述的重点做了调整,使得读者获得了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同样是歌颂查理曼的伟大,也是分类叙事,每一类事件大体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然而,作者聚焦于晚年查理曼,基于查理曼的晚年生活,通过典型化处理,达成刻画其伟大的生活品德。作者依类将所有内容都描绘在一个画面之中,众多的晚年生活挤占了画面,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而零星的中年生活则淹没于其中,所有的画面似乎都平铺在一个平面上,导致时间的纵深感消失。

这一选材重点的改变,达成了非常不同的叙事效果。与战争部分相反,传记的“私生活和性格”叙事相对而言更加真实可靠。传记的第一批读者尤其是虔诚者路易见过查理曼本人,甚至对查理曼的生活作息比较熟悉。但他们熟悉的也基本上是晚年查理曼。正是这一焦点的重合,充分发挥了艾因哈德亲近晚年查理曼的个人经历优势,使得传记的第二部分显得格外真实。

第 18-19 节说到查理曼对家庭的深情厚意,尤其是当亲朋好友去世的时候。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有母亲(783 年)、哈德良(795 年)、女儿吉斯拉(810 年)、儿子小查理(810 年)和意大利的丕平(811 年)。除了母亲贝尔特拉达外,这些人人都需要晚年查理曼去哀悼。对于他们的去世,通过刻画查理曼所表达的无尽哀思,作者彰显查理曼对他们的各种亲情:对母亲的孝顺、对姐妹的敬爱、对兄弟的手足之情或者对儿女的依恋之情。

艾因哈德也暗示了查理曼对女儿的约束颇有点不近人情。他竟然不允许女儿们出嫁。在《806 年分国诏书》中查理曼明确不允许女儿们出嫁。诏书第 17 款规定“关于我的女儿们,即我的上述儿子们的姐妹们,我下令,在我死后她们有权选择任何一位兄弟作为自己的照顾者和保护者。她们之中如果有谁选择了修道生活,得让她在她所选择的那个王国荣耀地生活在她兄弟的保护之下。她们之中如果有谁想过夫妻生活、合理合法地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作为配偶,只要男方的提议和女方的同意真诚且合理,她的兄弟们不得予以拒绝。”^①可惜的是,查理曼在 806 年之后还继续活了 8 年,女儿们的青春似乎因此颇有些耽搁。艾因哈德接受了查理曼的辩解,将这一不近人情的禁令归因于查理曼太爱女儿们,以至于离不开她们。这一禁令须置于查理曼有关继承的通盘计划中考量,此不赘述。晚年查理曼确实意志非常坚定,始终维持不允许女儿们出嫁的规定。

传记的第 20 节提到了庶子丕平的叛乱。驼背丕平的叛乱发生于 792 年,按照艾因哈德的计算方式,这一年查理曼正好 50 岁,可以算是查理曼老年的开始之年。随后叙述的两次叛乱则略早一些,分别发生于 785 年前后。严格说来这两次叛乱并不属于查理曼晚年的时间范围,但被作者用来巧妙地进行前后比较,“早些时候(*prius*)”与“此外,终其一生”(*ceterum per omne vitae suae tempus*) 相对比。通过比较凸显查理曼温和大度的品格,并顺利地把引发叛乱的责任都推到了查理曼当时的王后法斯特拉达身上。这种叙事策略的效果,是用晚年查理曼的善良仁慈说明他一生的仁慈和善良。

第 21 节,招待外宾的具体时间不详。第 22-24 节是著名的体貌特征描写。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发现这些体貌特征反映了查理曼晚年的身体状态。“头发美丽而呈白色”,如果查理曼不是少白头的话,那么这显然是老年人的标志。查理曼的健康状况也是基于他去世前四年到去世期间的状态。例如“他很健康,但是他在去世以前的四年间,经常发烧”云云。第 23 节,衣着,不详。里面提到两次他穿外族服装,第一次,不太明确,第二次,则肯定是在 800 年他去罗马加冕的那一次。所以,艾因哈德说,在称帝发生之前查理曼自己不知情,肯定不符合事实,要不然查理曼不会穿上那套外族服装,即加冕礼服。第 24 节,饮食睡眠习惯也明显属于老年人的习惯“他睡眠如此之不安

① 《806 年分国诏书》,李隆国译,载陈莹雪、李隆国主编《西学研究》第 3 辑,商务印书馆 2020 年版,第 83 页。

稳,竟至一夜之间醒来或者起床四、五次之多。”

第25节,介绍查理曼的语言文化水平,分别提到了查理曼的老师比萨的彼得和阿尔昆。比萨的彼得来到查理曼的宫廷中比较早,在776年左右,而且在艾因哈德进宫之前他就已经回到意大利了。阿尔昆是艾因哈德在宫廷里的老师。学界普遍认为,查理曼的统治存在从扩张转向文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大体以790年为界,^①查理曼学习文化知识,也应该发生在他的晚年时期。例如现存809年查理曼签发的一份敕令,提供了关于计算复活节的知识问答21道,查理曼请各地主教和院长给予答复。这份敕令以极其简略的方式总结了他们的回答,供查理曼参考。^②而查理曼学习书写所遇到的挫折,一般被认为是800年之后。^③“他还努力学习书写,为了这个目的,他常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刻使自己习惯于写字。但是他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开始得太晚了,因之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第26节开始讲述传主的虔诚,其中圣母玛丽亚教堂的建设始于793年,可能直到813年才最终竣工。他最后一次到罗马,即800年称帝事宜,都属于晚年的行状。第29节继续叙述查理曼称帝之后的一些重大活动;随后交待查理曼的去世,以大篇幅转述查理曼的遗嘱而告终。

遗嘱是查理曼人生的高光时刻,代表了老年查理曼最为无与伦比的帝王美德:虔诚,几乎将一切动产都奉献给上帝,以便获得上帝的恩典,进入天堂,获得永生,既符合《圣经》所言“如果你愿意作完全人,就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从我。”^④也为自己新获得的帝位提供最为完美的合法性保障:上帝。复述遗嘱与说明虔诚者路易乐意执行遗嘱,通过帝王之德的传承进一步强化了帝位的传承,为查理曼的帝王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聚焦于查理曼的晚年,正好印证了艾因哈德所申明的一个叙事原则“亲身经历”(ipse interfui)和“亲眼目睹”(praesens oculata)。我们并不能确知艾因哈德是何时进入宫廷,开始其廷臣生涯。现代学者推测,应该在790年前后。^⑤这个时候,正好是查理曼步入晚年的时节。所以,艾因哈德所能亲眼目睹和亲身见证的查理曼,只能是晚年查理曼。

二、亲身见闻与传记的可信度

围绕美德,艾因哈德描述了自己所见的查理曼生活诸面相:家庭、招待客人、体貌特征、饮食、求学、服饰等等。通过叙述查理曼晚年的这些生活习惯,艾因哈德展示了查理曼作为老年人的理想素质:对家庭的爱、对客人的友好大方、对饮食的克制、衣着朴实、对学问的追求以及虔诚。在刻画人物性格的过程中,艾因哈德模仿了苏维托尼乌斯。近年来《查理大帝传》与西塞罗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深刻的揭示。^⑥史源学分析充分彰显了艾因哈德的模仿性,但是,有关叙事技巧的分析,则强调了古代传记与中古传记所刻画美德的各自不同。^⑦确实,中古早期基督教德行脱胎于古代罗马流行的德行体系。在《论老年》中,西塞罗主张老年人的武器就是美德的培养和修炼。借老加图的嘴,以辩驳的方式,西塞罗说明了人应该如何度过愉快的老年生活。老年人以理智的态度活

① Jennifer R. Davis, *Charlemagne's Practice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51.

② “Das Aachener Verhör von 809 (Cap. comp.)”, in Arno Borst ed., *Schriften zur Komputistik im Frankenreich von 721 bis 818*, vol. 3, MGH., Quellen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Hannover: Hahn, 2006, pp. 1034–1054.

③ Paul Edward Dutton, *Charlemagne's Mustache and other Cultural Clusters of a Dark 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p. 69–92.

④ 《圣经·马太福音》(和合本)第19章21节。

⑤ Michel Sot & Christiane Veyrard-Cosme eds. & trans., *Eginhard: Vie de Charlemagne*, p. xi. 提出艾因哈德进入宫廷的年份为791年,这个时候艾因哈德大概15岁。

⑥ Matthew S. Kempshall, “Some Ciceronian Models for Einhard's Life of Charlemagne”, *Viator*, 26 (1995), pp. 11–37.

⑦ Matthias Tischler, *Einhard's Vita Karoli: Studien zur Entstehung, Überlieferung und Rezeption*, Hannover: Hahn, 2001, pp. 193–196.

到老学到老、锻炼身体、过着有节制的生活、不暴饮暴食、乐于交谈、一方面自信、安享宁静安逸; 另一方面勇敢地用美德和正义的行为赢得声誉、实现不朽, 也顺利地将物质和精神财富传给子孙后代, 使得接近死亡的“成熟”阶段变得非常可爱。^①

这些德行, 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晚年查理曼的身上。^② 所不同者, 在于艾因哈德更加强调对家庭的爱和基督教虔诚。传记的第二部分以家庭开篇, 充分细腻地表现查理曼对家人的深情厚意。以遗嘱结尾, 说明查理曼对穷人的牵挂、对教会的关心, 最终说明他对上帝的爱。如果说, 《论老年》旨在展示快乐幸福的老年, 那么《查理大帝传》的传主则是热爱家庭、热爱朋友、热爱生活和热爱上帝的人。这是一位充满爱的虔诚老年人。

艾因哈德模仿最多的是《神圣的奥古斯都传》;^③ 在刻画查理曼的家庭美德之时, 《查理大帝传》与《神圣的奥古斯都传》之间的异同, 颇类似于它和《论老年》之间的异同。奥古斯都和查理曼皆重视家庭, 深爱家人, 但是奥古斯都更符合《论老年》中的规范, 更偏重于家庭的快乐幸福。查理曼和奥古斯都在临终前都大方赏赐, 但奥古斯都的遗嘱表明, 其财产的主要受益人是军队和他自己的继承人, 而非穷人; 与查理曼不尽相同。通过模仿古代传记, 艾因哈德巧妙地借鉴古代传记的叙述程式及其彰显传主美德、刻画人物性格的传记书写功能, 表达符合当时文化语境的颂扬之声, 用古代传记体裁之旧瓶装入加洛林基督教美德之新酒。《查理大帝传》并没有直白地表达查理曼是否得到了永生,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行为, 表明其具备完美的基督教美德, 让读者自己去得出这个结论。半个多世纪之后, 结巴诺特克(即圣高尔修道院修士)的《查理大帝传》就明显将查理大帝神化。到12世纪, 查理曼最终被罗马教会封圣, 尽管封圣者是一位对立教宗帕斯卡尔三世(1164-8年在位)。

与《罗马十二帝王传》相比, 另一个巨大差异在于族群认同之不同。苏维托尼乌斯想当然地认为罗马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 其他族群皆为蛮族, 没有文化。作为一位蛮族, 艾因哈德在前言中反复烘托蛮族与拉丁文化之间的张力。与此类似, 他笔下的查理曼, 也是爱好罗马文化的蛮族帝王; 而且跟艾因哈德一样, 查理曼也深爱着法兰克习俗。从服饰、吃烤肉、骑马、狩猎、用法兰克语给风、月命名、完善各蛮族族群法典以及整理古法兰克语的歌谣等等。从衣着到生活习惯再到民族文化, 艾因哈德都在强调查理曼对本族文化习俗的偏爱。抛开作者的形塑不论, 或许, 人到晚年, 这种对故土的眷恋会来得更加浓烈一些?

同为帝王传记, 与《罗马十二帝王传》最大不同在于, 《查理大帝传》聚焦于查理曼的晚年。这一刻意选择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为查理曼辩护, 彰显其大度与虔诚的德行; 而且凸显了写作方法的创新。艾因哈德运用了独特的史料来源限定, 他的笔下是他本人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的记录。“我曾亲身参与这些事件, 身临其境, 而且众所周知, 目睹其事使我的了解变得非常可靠, 因此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比我更真实地记述这些事情。”^④ 通过讲述亲身经历的见闻, 不仅取信于读者, 而且在顺应新的历史写作潮流中告别了古代传记体裁。

年轻的艾因哈德与老年的查理曼在宫廷相遇。随着不断成长和成熟, 艾因哈德越来越接近查理曼, 可以凭借自己的所见所闻, 讲述一个真实的晚年查理曼。亲身经历和见闻, 使得艾因哈德的叙述无形之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威性。一代人之后, 瓦拉弗里德就在他为《查理大帝传》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艾因哈德在当时所有的宫廷官员中间享有最高的声誉, 这不仅由于他的学识渊博, 也由于他光明磊落的(引者据拉丁文本添加)超群品德; 而且, 由于他对于所描述的全部

① 西塞罗《论老年》, 徐奕春译,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第7-41页。

② 赵立行《西方史学通史·中世纪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93-94页。

③ Louis Halphen, *Éginhard: Vie de Charlemagne*,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1923, pp. x-xi.

④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第3页, 译文依据拉丁文本略有调整。O. Holder-Egger, G. Waitz & G. H. Pertz eds., *Einhardi Vita Karoli Magni*, 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911, p. 1.

事件,几乎都亲临其境,因之他的叙述在最严格的准确性方面更为见长。”在宫廷中获得盛誉,受到查理曼的信任,艾因哈德也就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查理曼的性格与习惯。

运用身临其境、亲眼目睹的选材原则到传记的写作之中,使得艾因哈德与苏维托尼乌斯迥然有别。他们两人都聚焦于传主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以反映传主的性格。但是,苏维托尼乌斯所描写的12位帝王,基本上都是作者没有亲身接触、至少没有时相过从的人物。因此之故,他只能依靠文献记载或者口耳相传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往往是“那些表现其性格的习惯性小事、辞令和玩笑”;^①它们固然有趣,也有利于生动形象地揭示传主的人物性格,但多难以取信于人,尤其是令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信服。^②

其实,《罗马十二帝王传》的这一局限性,来自于古代罗马传记体裁的写作规则。^③罗马第一位著名的传记家奈波斯和最为著名的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都表达了传记写作与历史写作之间的差异。通过搜集日常生活方面的言行,传记刻画人物性格,并以提供新材料、满足娱乐性和进行伦理教诲为尚。这种传记写作方式具有诸多优点,尤其是弥补了历史著述之不足,提供了历史叙事中不常见的诸多史料。^④奈波斯和普鲁塔克通过大规模地写作历史人物的传记,不仅保存了丰富别样的历史资料,而且通过刻画人物性格,开拓出历史传记的写作空间。

作为古典历史传记的杰出代表,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也经典地体现了这一体裁的优劣。轻松诙谐的笔法、大量丰富的人生细节描写,在愉悦读者的同时,也真伪难辨甚至刻意混淆是非。“苏维托尼乌斯之所以令现代读者恼火,那是因为他们希望将他的作品用作史料,获得有关罗马皇帝统治时期史事的如实描述”;“经过他的引用,大量有意义的文献资料得以保存下来”。^⑤丰富资料与难以确定的可信度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古代历史传记留给了中古早期传记家的是一份是非糅杂的遗产。

近年来,历史学家也注意到了《查理大帝传》与另一部古代传记、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⑥为自己的岳父辩护,塔西佗可能将传记作为发达形式的谏辞。^⑦通过赞美岳父的品格、谴责暴君图密善,《阿古利可拉传》似乎也带有殉道者传的色彩。^⑧由于带有过于强烈的辩护色彩、鲜明的憎恶之情,塔西佗可能足以抒发当时一部分元老们对于专制皇帝的的不满和憎恨,但也因其过于极端而难以取信于读者。如同中译者所言,“并不是很成功”。^⑨确实,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诙谐有余,而肃穆不足;与之相比,塔西佗就充满了站在道德至高点的严肃性。《阿古利可拉传》类型的传记在古代晚期也屡见不鲜,最为有名者如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所著之《君士坦丁传》、《巴勒斯坦殉道士列传》、米兰的保拉所著《安布罗斯传》等。这些传记承前启后,链接了古代传记与中古传记。

① 李隆国《“非撰史,乃作传”解——兼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真实观》,《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9页。

②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vii-ix页。

③ 孙文栋《试论19世纪以来〈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史学”与“传记”研究传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17卷第2期,2017年;吕厚量《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Edna Jenkinson, “Nepos—An Introduction to Latin Biography”, in T. A. Dorey ed., *Latin Biograph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7, p. 4.

⑤ G. B. Townend, “Suetonius and His Influence”, in T. A. Dorey ed., *Latin Biography*, p. 84.

⑥ Rosamond McKitterick, *Charlemagne: The Formation of a Europea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20.

⑦ Anthony R. Birley trans., *Tacitus: Agricola and Germa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xiv.

⑧ Dylan Sailor, “The Agricola”, in Victoria E. Pagan ed., *A Companion to Tacitus*,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 39.

⑨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马雍、傅正元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页。对此,伍德希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和阐发, A. G. Woodhead, “Tacitus and Agricola”, *Phoenix*, vol. 2, no. 2, 1948, pp. 45–55.

中古早期广泛流行的圣徒传, 续接罗马帝国晚期的殉道者传而来。圣徒传中的圣徒尽管业已去世很久, 甚至几百年; 从宗教意义上, 他们仍然活着, 作为永生的灵魂通过奇迹继续影响当代人。不仅如此, 圣徒以圣骨、墓地、遗物等为媒介, 继续受到世人的礼拜。通过描述奇迹等, 圣徒传颇能将古今历史折衷于一处。不仅如此, 在肉体死亡之后, 永生的圣徒进一步突破了在世时的生活空间, 拓展出更为广泛的时空影响范围。因此, 圣徒传固然会讲到圣徒在世的某些经历, 其重点也还是申述其所以称圣的那些德行, 以便作为人们的榜样。^① 从这个角度而言, 从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中经殉道者传, 中古圣徒传是古代传记的另外一种发展形式。它们共同以亲身见证的方式讲述着传主的德操。在传记的愉悦性之余, 中古早期圣徒传也更加强调严肃的教喻性。^②

艾因哈德在 828 年也曾经写作了圣徒传, 讲述他如何派遣手下前往罗马, 千方百计地获得了圣彼得和圣马尔塞里努斯的圣骨, 随后护送、迎接、安置圣骨。作品也记录了在此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奇迹故事。从这部《殉道者彼得和马尔塞里努斯圣骨迁移记》来看, 艾因哈德特别强调奇迹故事必有所据、是讲述者的亲身经历。例如他提到, 虔诚者路易的图书馆馆长杰瓦尔德如何亲自调查一位女信徒, 确认其所经历的奇迹故事。在返回宫廷之后艾因哈德的这位密友将奇迹故事转述给皇帝听, 以至于这两位被艾因哈德新近引入的圣徒所行的非凡奇迹故事轰动了整个宫廷。^③

圣徒传以极端的方式暴露了传记体裁的内在张力, 即保存史料与可信度的紧张关系。奇迹故事良莠难辨, 但在信仰基督教的宗教文化氛围之中, 不仅颇能迎合读者的趣味, 相当受欢迎; 而且以见证者的亲身见闻, 在喜闻乐见之余, 保证了其可信性。艾因哈德在写作圣徒传的时候, 也贯彻了这一原则, 将亲身见闻作为史源限定, 从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奇迹故事的滥用, 获得图书馆长和皇帝的信任。不仅如此, 也是基于亲身见闻来塑造查理曼的形象, 艾因哈德的传记叙述展示了相当高的可信度, 克服了古代传记的致命弱点, 随后就以真实可靠博得了瓦拉弗里德的高度赞扬。

三、神似与形似之间

但是, 现代历史学家却并不像瓦拉弗里德那么“天真”, 经过史源分析和史料考证, 《查理大帝传》似乎硬伤累累。例如, 查理曼的体貌特征, “他的躯体高大而强壮, 身材颇长, 但是并不粗笨, 他的身长是脚长的七倍, 头顶呈圆形, 眼睛很大, 目光敏锐。他的鼻子比一般的大些, 头发美丽而呈白色, 神态活泼愉快; 因此无论或坐或立, 面容总是庄严而感人。虽然他的颈部有些粗短, 身材有些肥胖, 但是由于身体的其余部分很匀称, 这点并不显著。他的脚步稳重, 全身的姿态很雄伟; 他的声音清晰, 但是简直并不象你所预料的那样洪大。”(第 22 节)

照道理, 描写查理曼的体貌特征, 艾因哈德应该不会出错, 但是, 这段话大量借用了《罗马十二帝王传》的语句。“他的躯体高大而强壮, 但是并不粗笨”来自《神圣的提比略传》, “身材颇长”语出《神圣的卡里古拉传》, “眼睛很大”又抄袭自《神圣的提比略传》, “头发美丽而呈白色……无论或坐或立, 面容总是庄严而感人”借用自《神圣的克劳狄乌斯传》; “他的颈部有些粗短, 身材有些肥胖”套用了《神圣的尼禄传》; “但是由于身体的其余部分很匀称, 这点并不显著”, 则化用了《神圣

① Hippolyte Delehaye, *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 trans. Donald Attwate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3-4. Stephen Nakrosis, “History and Hagiography: Researching Modern Saints and Beati”, *The Catholic Social Science Review*, 22, 2017, pp. 268. 王珞《圣徒传记与中世纪盛期西欧教俗关系变迁》,《史学月刊》2022 年第 6 期。

② Janez Mlinar, “Medieval Biograph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llective”, *Ars & Humanitas: revija za umetnost in humanistiko*, vol. 15, no. 1, 2021, pp. 171-181. Lars B. Mortensen, “Roman Biography in the Medieval West: Did Classical Texts Facilitate Complex Literary Portraits in the Middle Ages?”, in Koen de Temmer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547-561.

③ Einhard, “The Translation & Miracles of Marcellinus & Peter”, in Paul Dutton trans. & ed., *Charlemagne’s Courtier: The Complete Einhard*,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1998, pp. 115-116.

的奥古斯都传》的描述。^①

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艾因哈德的真实并不是今天的历史学家所崇尚的符合论真实观;作为在查理曼宫廷中成长起来的廷臣,艾因哈德也深受宫廷中浓厚的文化复兴氛围所熏陶,尤其偏好用典,借用古代的术语和典雅文句说话和纹饰行文。例如他们将查理曼称呼为“大卫”,把阿尔昆叫做“阿尔比努斯”等等。艾因哈德在前言中曾公开申明,要借助于西塞罗的雄辩才华,来为查理曼作传、讴歌自己的恩主。

除了用典、使用古代修辞以示高雅博学、表达得体之外,从《查理大帝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艾因哈德惯用的修辞手法,这里仅仅从真实性的角度略举数例。例如作者频繁使用最高级来称呼查理曼;描述实际发生的政治动乱之时,将责任甩锅给外戚或者贵族,替传主洗白;再如对传主人生中那些不便启齿的经历保持沉默,例如说查理曼没有童年;还有对传主不近人情的家庭规定用爱的方式加以“曲解”,说查理曼太爱他的女儿们以至于不让她们出嫁;而更多的场合,则巧妙地将传主个人所经历的挫折转化为德行叙事。查理曼不识字,学习书写不成功,但是艾因哈德的描述淡化了失败,而强调了传主努力学习的精神,查理曼竟然有毅力在晚年开始学习,并且学得非常认真,何其可歌可颂!^②这套修辞手段,我姑且称之为廷臣手法,艾因哈德运用得体,所以瓦拉弗里德会赞美他为不倒翁“明智的盛名,虽有多人嫉妒和多人揶揄,却不曾非时地从他身上消失,也不曾置他于不可挽救的危难之中”。

但是,透过艾因哈德这些刻画人物性格的修辞,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其文字背后那个存在诸多不足的查理曼。以苏维托尼乌斯为代表的古代传记,胜在神似,刻画符合当时读者所预期的历代帝王形象。对于这一传记功能,他的同代人、大文豪普鲁塔克说得明白“正如画家抓住脸部和眼神——透过这些可以展示性格——以图对象之神似,而相对忽略其余部位。同样我也要通过这些心灵的迹象,据此来创作每一个传记。”^③艾因哈德也努力地刻画人物性格,极其热情洋溢地歌颂后来者的查理曼,这位战无不胜、充满爱心的虔诚老年君王。这一“神似的”形象,就是如瓦拉弗里德所称颂的那样“无比权威(potentissimus)、无比聪睿(sapientissimus)”^④;这也是结巴诺特克在60多年后重写《查理大帝传》时所恪守的查理曼形象。

但是,在神似之外,艾因哈德也追求形似。^⑤其实现途径就是亲身经历,据此“没有人能够比我更真实地记述这些事情”。追求神似,意味着要迎合传统的传主形象而通过有趣的日常细节加以塑造,以达成性格真实或者德行真实。用历史哲学的话语来讲,神似旨在塑造一种可能性,说明传主应该是某类人。形似则须说出真相,直书所见,将实际发生的情况记下来,即所谓如实直书,以达成事实真实。写作传记的时候,神似与形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没有性格真实与德行真实,则无典型化,从而也就失去了文学性;没有事实真实,则不复为历史记载,失去其历史性。在有争议的场合,《查理大帝传》的神似,是传主对各种理想美德的追求;而事实真实,则是隐身于这种追求背后的人生缺憾,尤其是传主素质的不足以及追求结果的不甚完美。通过语言修辞,尤其是迂说法,艾因哈德巧妙地运用了廷臣手法劝说加洛林君王,劝勉他们向善并补正不足。

这种委婉的修辞和劝说方式,非常具有迷惑性。例如,有关查理曼学习书写的描述,随后演变为著名的查理曼善于读书识字的桥段。在《查理大帝传》完成之后不久,瑟甘于835年前后写作《虔诚者路易传》。在开篇他交待了查理曼之死。临终前的查理曼不仅不是文盲,相反是一位充满经学素养和宗教追求的经学家。“在父子分别之后,皇帝老爷(查理曼)没有做别的事情,而是有空

① O. Holder-Egger, G. Waitz & G. H. Pertz eds., *Einhardi Vita Karoli Magni*, pp. 26–27.

② Paul E. Dutton, *Charlemagne's Mustache and Other Cultural Clusters of a Dark Age* pp. 69–92.

③ 李隆国《“非撰史,乃作传”解——兼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真实观》,第229页。

④ O. Holder-Egger, G. H. Pertz & G. Waitz eds., *Einhardi Vita Karoli Magni* p. xxix.

⑤ 夏玉玲《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与加洛林文艺复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就祈祷和布施,并校正图书。在临终前的最后时光,他与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一起积极地校订四大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①可能瑟甘想神化查理曼,但是艾因哈德的巧妙修辞无疑为瑟甘实现其意图提供了基本的原材料。在结巴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中,查理曼业已转型为能检查学童诗文的“一向喜爱和追求知识的国王”了。^②

至今,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留下了大约 130 个中古抄本,而依托于他的传记,中古时期围绕查理曼还衍生了诸多的传奇故事,进一步塑造各种神似的查理曼形象。经过不同作者的再加工,查理曼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民间传奇中扮演特定功能的角色。而艾因哈德提供的形似的查理曼形象、那个有着不少需要加以掩饰和曲解的人生缺憾的查理曼,被神似的查理曼形象所遮蔽。直到 18、19 世纪的史料批判之学兴起,这个形似的查理曼才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帮助历史学家实现复原查理曼的理想。但直到 20 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历史学家重拾对中古早期史学的信心,艾因哈德的查理曼才变得更加可信起来。“艾因哈德的读者或者听众都认识查理曼以至于他的描述不可能离事实太远,对苏维托尼乌斯的利用服务于树立查理曼的形象。”^③艾因哈德或多或少会受到模板的限制,也容有歪曲失真之处,但其写作内容大体可靠。在明了艾因哈德叙事的廷臣手法之后,神似与形似的区分及其巧妙结合方式得以显现,读者似乎就可以解开神似的修辞符号、透过廷臣话语更加清晰地看见形似之所在,从而趋近于那个真实的查理曼。^④

四、走向编年的中古君王传记

历史学家指责艾因哈德过多地受到了古代传记体裁的束缚。确实,与古代传记的相似掩盖了加洛林传记体裁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就在《查理大帝传》写作完成之后不久,君王传记写作发生了体例改变,艾因哈德复兴的体裁形式遭到扬弃。虔诚者路易的两部传记,分别为瑟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和天象学家的《虔诚者路易传》(约创作于 840 年代)。这两部传记都放弃了《查理大帝传》依类叙事的结构,而是按照编年的顺序叙述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的生平事迹。如瓦拉弗里德在前言中所言“瑟甘按照编年史的方式写作了这部短作品”。^⑤按照时间线性地叙述,使得传记从叙事结构上融入到当时流行的编年体史书的主潮之中。此后写作的当代帝王传记,几乎都会恪守时间的次序,以基督纪年为框架,顺着传主的人生经历轨迹,逐年叙述。这种改变,可以称之为传与史的汇合,即传记体裁与编年史体例合而为一。

在历史文献学中,中古时期常见的俗人传记被称为“Gesta”,往往被归属于具有基督教渊源的体裁,与延续古代传记特征的圣徒传(Vita)体裁有别。这些俗人列传“按照任期来讲述一系列教/俗人士的事迹,遵循严格的编年顺序和传记框架。然而这些传记并非严格意义的传记之汇编,因为它们过于依赖于编年史的体例,而罕见性格描写和伦理教喻。”^⑥虔诚者路易的两部传记被归入此类,而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则被归入“Biography”体裁。其基本特征乃是富有文学技巧地刻画性格。“此类作品只有借助于加洛林文艺复兴并接触古典作家方才有可能为之……也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发展,因此,在艾因哈德之后,这种类型的传记再次出现在阿尔弗雷德统治

① Ernst Tremp ed. & trans., *Theganus, Gesta Chludowici imperatoris*, c. 7, MGH., SS. Rer. Germ., Hannover: Hahn, 1995, pp. 184–185.

② 圣高尔修道院修士《查理大帝传》,臧国淦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39–40 页。

③ Michel Sot & Christiane Veyrard-Cosme eds. & trans., *Eginhard: Vie de Charlemagne*, p. xxxiii.

④ Janet L. Nelson, *King and Emperor: A New Life of Charlemagn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 7.

⑤ “Walahfridi Prologus”, in Ernst Tremp ed., *Theganus Gesta Hludowici imperatoris* p. 168.

⑥ R. C. Van Caenegem ed.,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Medieval Hist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 1978, p. 34. R. C. Van Caenegem & L. Jocqué eds., *Introduction 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diévale*, trans. B. Van den Abeele, Turnholt: Brepols, 1997, pp. 50–51.

时期的英格兰、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与法国。”^①

这种分类方法,难免不周。不论这些俗人传记是否具有文学技巧,也不论其作者花费了多少笔墨刻画性格,它们基本上都按照编年方式安排叙事。编年史与传记的融合使得两部虔诚者路易传不仅可以叙述传主完整的一生,不像《查理大帝传》那样缺失童年;而且也在艾因哈德创立的亲身经历原则基础上结合编年体例,从而奠定了中古俗人传记的基本体裁格式:编年体传记。

880年代,结巴诺特克重新写作《查理大帝传》还是遵循了艾因哈德的体例,分类叙事,这一体例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力,塑造神似的查理曼形象,以教喻读者。但其他的诸多君王传记,都沿着虔诚者路易传的体例,按年代顺序说事。最为著名的例子,要数9世纪下半叶艾瑟的《阿尔弗雷德大王传》。这篇传记不仅完全按照编年顺序,而且许多内容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内容重合。由于现存抄本都晚于12世纪,所以,长期以来其真实性备受质疑,被误以为是后人利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伪造的历史作品。^②

采用编年体例,也使得复兴之后的君王传记与圣徒传保持相当的距离。如前所言,圣徒传由于传主自身的永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永恒性,其历史性色彩并不是很强。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奇迹见证者共同见证了圣徒的永恒及其中保威力。而采取编年体例的君王传日益与编年史发生交汇乃至重合,也承担起编年史所具有的计时和叙事功能,具备了外圣内王的体裁形式与内容。^③可以说,艾因哈德之后的君王传记发展了《查理大帝传》的形似的那一面,而神似形象的建构色彩相对淡化。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则会发现,传记与编年二体角力,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独特现象,也是中西古代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体裁竞争现象。比艾因哈德早一个世纪的刘知几曾总结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接着他列举了晋宋时期的史学名著,说明“各有其美,并行于世”。^④西方古代史学也是传记与编年史二美并行,奈波斯和普鲁塔克等人刻意强调了传记的独特性。^⑤然而就在刘知几的总结之后,中国正史的本纪编年化,纪传体吸纳了编年体的功能,从而呈现出纪传与编年两种体裁互相融合的现象。几乎在同一时期,拉丁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史学变动趋势,传记与编年史在体裁上保持独立的同时,也在功能上互相融合。

例如,在作品的传抄过程中,二者的界限往往被打破。现藏于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拉丁文抄本510(Wien, ÖNB, Cod. 510)的基本内容于10下半叶抄录于今法国北部,里面依次包括《罗马教宗列传》、卢奇亚努斯的《圣斯蒂芬遗骨发现记》、《法兰克人史记》、《弗莱德加编年史》、《繁本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查理大帝传》、《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修订版)、《皇帝查理老爷的谱系》以及《法兰克史摘要》。抄录者将《查理大帝传》的第二部分(从第18节开始)插入到《繁本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与《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之间。^⑥以书籍汇编的形式编年体与传记共同合成一部大历史,在维持体裁独立的同时,二体并美于一书。

不仅如此,9世纪初艾因哈德复兴古代君王传记,沿袭了古代传记独特的叙事编排体例,依类叙事,与当时刚刚兴起的以基督纪年为特征的编年史迥然有别。但此后的拉丁君王传记普遍采用

① R. C. Van Caenegem ed., *Guide to the Sources of Medieval History*, pp. 42-43; R. C. Van Caenegem & L. Jocqué eds., *Introduction aux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diévale*, B. Van den Abeele trans., pp. 62-63.

② 早期的讨论,请参考 W. H. Stephenson ed., *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9, pp. 61-89. 关于其真伪的较新总结,请参考 S. Keynes, "Introduction", in idem & M. Lapidge trans., *Alfred the Great: Asser's Life of King Alfred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ources*, Penguin Books, 1983, pp. 50-51.

③ 李隆国,《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④ 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6页。

⑤ 王成军《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及其趋向之比较》,《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⑥ Wien,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ÖNB), Cod. 473, https://manuscripta.at/hs_detail.php?ID=9841。

编年体、传记与编年体裁上的区分日益淡化,编年与传记二体并美于一体。例如前文所举的《阿尔弗雷德大王传》,就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体例上难以区分。另一方面,数量远为庞大的圣徒传,仍然多袭用依类叙事的体例,与编年体二体角力,反映不同的社会主体。二体维持独立状态之下也存在二体融合、互美于一体的新趋势。从传记与编年二体角力的角度来看,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似乎确实沿袭多于创造。它承前启后,为后面中古编年体俗人传记的出现鸣锣开道。

但是,从神似与形似的巧妙结合而言,《查理大帝传》允为杰作。通过巧妙地吸纳古代修辞技巧,以圆润委婉的廷臣修辞风格,不回避传主的各种缺陷,而是以各种修辞方式曲为之辩解,将传主的不足转化为德行叙事,使得形似与神似和谐共存,满足了不同价值取向的读者的阅读预期,从而被更多的读者接受。在圣徒传流行的文化背景之下,此后续接艾因哈德,继续改编查理大帝生平的作者大力发展了传记中神似的查理曼形象,基于美德塑造乃至神化查理曼,创造了丰富的传奇作品。^①及至于近代的史源学研究,艾因哈德袭用古代传记体裁的事实大白于天下,其形似的查理曼形象也颇受到诟病。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史料限定原则,我们不仅可以更加细腻地感受到传记中神似与形似的巧妙结合、鉴赏作者辩护之有方;也能透过修辞的字里行间,挖掘出查理曼的诸多人生缺憾。艾因哈德在前言中说“值得用西塞罗的全部雄辩才华来记载”。诚哉斯言!

① Matthew Gabriele, Jace Stuckey eds., *The Legend of Charlemagne in the Middle Ages: Power, Faith, and Crusad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xiii-xiv.

Eyewitness Testimony: Einhard's *Vita Caroli Magn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Latin European Biographies

Li Longguo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of research on Einhard's *Vita Caroli Magni*,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with Suetonius' *Vitae Caesarum Duodecem*, and there has been, and still is, hot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consequently, the reliability of Einhard's description.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works in their individual manner of choosing sources. However, by introducing the rule of eyewitness testimony, Einhard imposed a strict limitation on the choice of sources, which lent authority to the author. The *Vita Caroli Magni* with its idealization of the virtues of its subject and its search for truth convinced readers of its reliability. Adopting the form of chronicle, later biographer strengthen narrativity and objectivity, and create a new classical form for the medieval secular biography.

[Key words] *Vita Caroli Magni* Einhard chronicle biography

(责任编辑 董立河 刘林海)